

尋找星星 黑夜中

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

陳銘城 黃年 徐璐 李永得 徐健壯 王健壯 楊渡 楊惠宏 戎撫天 周天瑞 殷允芃 李旺台 吳豐山 南方朔 俞國基 黃肇珩 薛心鎔 司馬文武

何榮幸◎策畫、導論
台大新聞研究所◎召集、採訪／張錦華主持，林麗雲、洪貞玲協同主持
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贊助出版

尋找黑夜中 星星

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

陳銘城 黃年 琦 徐永得 李健壯 王渡 楊惠宏 戎天渡 周天瑞 殷允芃 李旺台 吳豐山 倪國基 南方朔 薛心鉻 蔡鑑珩 司馬文武

何榮幸◎策畫、導論
台大新聞研究所◎召集、採訪／張錦華主持，林麗雲、洪貞玲協同主持
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贊助出版

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

策畫導論—何榮莘

召集採訪—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張錦華主持，林麗雲、洪貞玲協同主持）

主編—陳俊斌

編輯—潘乃慧

美術編輯—張瑜卿

執行企畫—曾秉常

董事長—孫思照

發行人—莫昭平

總經理—莫昭平

總編輯—林馨琴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803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三樓

發行專線—(02)2310616841

讀者服務專線—0800-131-1705

(02)23104171011

讀者服務傳真—(02)2310416858

郵撥—一九三四四七一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件信箱—hi.history@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 刷—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〇八年一月一日
定 價—四〇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80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78-957-13-4781-3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受訪者歷史年代對照表

058

Part 1 .. 他們看見了歷史 028
045

〔導論〕——何榮幸

追尋烏托邦／鄭瑞城（前任政治大學校長） 006
這是本有意義的好書！／朱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009
台灣新聞自由今昔／孫震（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董事長） 013
[計畫緣起] 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
回首來時路／莫忘初衷／張錦華 018
老靈魂與新生命的奇妙交織／何榮幸 023

一、與警總「捉迷藏」的日子：一九七九年黨外雜誌健將／司馬文武——只想當「真正的記者」

二、大陸來台的愛國媒體人：一九五〇年大華晚報創辦人／薛心鑄——一甲子的信守與體驗

三、第一位女性黨營媒體高層：一九五九年中央社記者／黃肇珩——

我是「記者」，不是「女記者」！

117

四、來自中南部的聲音：一九七一年台灣時報總編輯／俞國基——凌空看政治的專業新聞人

145

五、一輩子的評論志業：一九七二年民族晚報記者／南方朔——從文藝青年到自由左派

171

六、連寫二十年個人專欄：一九七五年自立晚報撰述委員／吳豐山——記者是永遠的社會改革先鋒

195

七、美麗島事件見證人：一九七九年台灣時報採訪主任／李旺台——對抗威權體制的南部記者

219

八、國際媒體聲援美麗島：一九八〇年紐約時報駐台記者／殷允芃——我自己跳下來幫台灣加分

243

九、海外華文媒體的宿命：一九八四年美洲中時總編輯／周天瑞——永遠在找最大公約數

271

十、解嚴前夕的主流媒體：一九八四年聯合報政治組召集人／戎撫天——
曲筆奮進迎向新時代

301

十一、公害環保風潮：一九八五年聯合報環保記者／楊憲宏——
科學精神的人文記者

333

十二、反杜邦運動與社會力：一九八六年時報新聞周刊記者／楊渡——
以報導文學實踐文人理想

361

十三、破繭而出的政論雜誌：一九八七年新新聞總編輯／王健壯——
永遠的自由派

393

十四、歷史性大陸行之一：一九八七年自立晚報政經研究室主任／李永得——
絕不妥協的硬骨記者

419

十五、歷史性大陸行之二：一九八七年自立晚報政經研究室研究員／徐璐——
不斷追尋自我的女記者

441

十六、五十八天創辦新報紙：一九八八年聯合晚報總編輯／黃年——
黑金政治的命名者與批判者

465

十七、解嚴後政治人權報導：一九九一年自立早報記者／陳銘城——
為受難人權發聲

495

追尋烏托邦

這是新聞人追尋烏托邦的故事——但就像柏拉圖、摩爾或貝米拉對烏托邦各有一些不同的想像。

烏托邦（Utopia）的希臘字源有兩種意義：完全美好之地或烏有之地。縱使眾裡尋它千百度，宇宙人間是烏（沒）有完全美好之地的；這一點，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人生百態的新聞人一定更能體會。但是人類似乎從來沒放棄對烏托邦的憧憬，並經常付之行動去追尋——有時甚至是以飛蛾撲火之姿在追尋著；從書裡的新聞人的自述中多少存在著這麼一種精神和意念。就是這種精神和意念使台灣走向：雖非烏托邦——卻是更美好之地。

台灣在威權體制的戒嚴時代，絕對稱不上美好之地；一位在一九七〇年代受牢獄之災的作家甚至

以「看過地獄回來的人」自況並形容那個時候的台灣。台灣在歷經約四十年的戒嚴統治，終於游過了一條又一條湍急、凶險的河流，渡到了民主的對岸；而這群新聞人也歷經身心煎熬，在時代洪流裡載浮載沉地到達彼岸。說「煎熬」可能還低估了些，一起走過來而對媒體略有瞭解的人，大概多少可以感同身受。

在那樣的年代裡，媒體習常是統治者的工具，記者習常是統治者的幫手，由不得新聞專業扮演和作祟。而這群新聞人中的大多數人（在當時，他（她）們其實是少數者）卻堅持新聞專業理念，以強烈的使命感、正義感和理想性，堅持正確地報導事實真相，堅信媒體和記者既是穩定、更是改革社會的重要動力。他（她）們當時都被主流政治勢力冠上「亂源」的封號，但他（她）們是為公為義，為捍衛新聞人的專業尊嚴，和強大的主流勢力抗衡，這和今日媒體人被稱為社會「亂源」，不可同日而語。是什麼力量支撐他（她）們有勇氣在那個時代挑起那樣的重擔？他（她）們的靈魂深處必然埋著這樣珍貴的種子：深信人類可以更美好，台灣可以更烏托邦；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應該更相互尊重、更相互寬容、更訴諸理性、更追求正義。

我們要向他（她）們這種珍貴的心靈和實踐新聞專業的勇氣致敬。

我們也要向本書的策畫人及台大新聞所的師生表示敬意。他（她）們在解嚴後二十年的今天，以虔誠之心和專業作為，為值得尊敬的新聞人寫下生命史，給予應有的肯認和歷史地位；並將這些史料作各種方式的紀錄和儲存，為台灣新聞史留下珍貴的史頁，供後來者有機會繼續探索、親炙前輩新聞人的典型和風範。台大新聞所和策畫者做了一件令人感動的事情。

反觀今日台灣媒體整體性的亂象，自然令人興起無限的感慨。我相信，台大新聞所那麼用心地做這件事，不只是要告訴我們：台灣已有新聞人的典型，惟典型皆在夙昔；本書編撰者更想告訴我們的應該是：是的，許多人對現今的媒體和社會亂象都深有感慨，但我們絕不能放棄對烏托邦的追尋及人

類可以更美好、台灣可以更烏托邦的精神和意念。這是本書出版最感人和最有意義之所在。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作者為前任政治大學校長)

朱立

〔推薦序〕

這是本有意義的好書！

十七位台灣資深記者口述了他們從事新聞工作的歷程，記錄了他們在戒嚴時期爭取言論與新聞自由的點點滴滴以及反躬與自省，既無悔，也無奈，既滿足，又感慨！對二、三十歲的年輕一輩言，這本書所呈現的可能只不過是紙上的歷史，但對上一代的媒體工作者言，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活生生的共同記憶！今天我們享有言論與新聞自由，這十七位以及無數位曾經為自由、民主而奮鬥、犧牲的人功不可沒！

這十七位記者，有學法律的、政治的、歷史的、新聞的、外文的，還有學森林與醫學的；有人一開始更立志從事新聞或寫乍工作，也有人則誤打誤闖地入了新聞這一行；他們有人在國民黨的傳媒工

作，也有人在當時仍然稱爲黨外的刊物服務。他們的背景、動機、處境不盡相同，但一旦入了行，他們都敬業、盡職，堅持奉獻專業，總設法在可能範圍內，把哪怕只有一點點的自由發揮到極致，並在必要時開拓言論的空間。這些人既有熱情，也有勇氣，熱情令他們鍥而不捨，堅守新聞專業崗位，勇氣令他們敢向上司與監控傳媒的情治單位力爭。熱情與勇氣之外，他們還擁有不斷學習、思考的智慧，使他們在險惡的環境裡避凶趨吉，就這樣，在迂迴、對抗、後退、前進中，台灣的言論與自由空間一步一步地擴張、變大了！

對這十七位記者而言，他們很幸運地遇到了賞識、提拔他們的老闆兼良師，老闆們還在必要時支持、包容、保護他們。老闆們固然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網，但這無礙於他們在關鍵時刻只問「有沒有依據」；有，那就見報、刊登，而壓力與責任便落到了這些報老闆的身上！無論是王惕吾、余紀忠、吳三連或吳基福，他們都具有頗深的人文修養與關懷，有擔當，也有大氣度。他們出身不同，但都擁有所謂傳統知識份子的志氣，一心一意要辦份「不黨、不私、不賣」的報紙！

任何記憶都是選擇性的，有些記憶令人歡欣，有些記憶令人緬懷，有些記憶教人嘆息，也有些記憶教人感傷！有些記憶是愚蠢的，有些記憶則是智慧的！愚蠢的記憶傷身更傷心，教人消沉頹喪，最愚蠢和最惡毒的記憶則是挑起傷痛，並在上面撒鹽！智慧的記憶不然，無論它教我們感傷，還是教我們歡欣，無論它教我們緬懷，還是教我們嘆息，它都會令我們反思，並從中得到鼓舞，然後再衝向前！《黑夜里尋找星星》教我們從過去看現在，也教我們從現在思考未來，它是智慧的記憶！

解嚴、解除黨禁與報禁已經二十年了，也經歷了三次總統直選。從宏觀的角度看，與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相比，台灣所享受的民主與自由似乎不遑多讓！然而，從微觀的角度看，我們民主與自由的品質實在太差了，差到令人擔憂！我們的選舉頻繁、喧囂、浪費，操控多過爭辯，口水多過政綱。選舉完後，有人當了官，有人做了議員，喧囂吵鬧依舊！不是肢體的暴力，就是語言的暴力！沒錯，我們

實施民主與自由的歷史還短，我們還在學習！西方國家也有政爭，然而我們看不見議會裡拳腳交加，也聽不見惡言相向，我們更聽不到領導人或官員們會用粗俗的語言攻擊政敵，然而在我們所居住的台灣都出現了！官員與議員出國觀光、考察的機會絕對不少，不可能不知道這些最基本的民主與議事規則，為什麼學了這麼久還沒有學會呢？他們太精？我們太蠢？把他們的愚蠢當成了智慧，投了他們的票？對於社會與政壇的亂象，傳媒本應是批判者與監督者，不幸的是我們的傳媒卻成了亂象的始作俑者之一，傳媒「已經在藍綠陣營中就位」（江春男語），傳媒「太政治了」（俞國基語）！黃年的感嘆是：「曾是璞玉的『台灣革命』，已經被惡匠雕成羅刹，而不是觀音。」楊憲宏則說：「媒體變成一個被打開的潘朵拉盒子，各種價值流失了，根本沒有機會生根。」戎撫天更直接了當地說：「這是媒體工作者深沉的悲哀。」

在威權時期，操控言論與媒體的是黨國政治機器赤裸裸的干預和暴力；解嚴後的民主時期，操控言論與媒體的力量已被大、小政客們的迷幻語言與媒體的市場考量所取代。政治機器的介入，我們比較容易察覺，也比較容易激起反抗；但迷幻的語言與市場商業利益的介入，則是對傳媒閱聽人身心的有害按摩，而這種慢性麻痺與窒息卻是一般人不易察覺的。最可怕與更可憂的是，一般人反而可能甘之如飴而上癮，直至致命而不知！如果我們只為宏觀上所取得的民主沾沾自喜、故步自封，對在微觀層面所見到的亂象不加批判、導正，宏觀的成就也可能會遭到腐蝕而化為子虛烏有！在威權時期，破壞新聞自由的是政治力量，在威權解體後的民主時期，破壞新聞自由的則既來自政治，也來自市場。於是，回歸專業、呼喚克制便成了這些資深記者的心聲，也成了許多有心人的殷切期望！

在美國首府華盛頓，韓戰紀念碑上刻著「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必有代價」，真是善哉斯言！我們絕不能因為見到民主與自由之亂象，而緬懷昔日威權之治，因為「不自由的代價更大」！我們已經爭取到了自由，便更要保育、充實得之不易的自由；我們要對抗政經機器的干預與破壞，也要

對抗墮落政客與媒體人的干預與破壞。在媒體意識形態的爭霸戰中，有良心的媒體人絕不能鬆懈，要打一場持久戰！今年十月，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舉辦「台灣解嚴二十週年研討會：威權解體與新聞自由的崎嶇路」，並策畫出版《黑夜中尋找星星》，這有助於我們記憶與反思！記憶與反思並進，我們才有跳脫政治與傳媒惡鬥困境的可能！

我過去三十年在香港度過，其間經常返台公幹、探親或訪友，對成我、育我的台灣無一日或忘。因為從事新聞傳播教育工作，我也認識了些台、港兩地的資深新聞媒體人，對他們促進自由、推動民主的奮鬥，我由衷地敬佩！我也有著他們同樣的憂心，但我並不悲觀，我認為哲學家尼采說得好，「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如果我們見到的是政治與傳媒的亂象，那我們就是「受苦的人」；如果我們還希望台灣一天比一天好，那我們也就「沒有悲觀的權利」。我深信，台灣還有許許多多具有同樣想法的人，而這就是我們的希望所在！

謝謝台大新聞所主持計畫的老師，謝謝負責訪談與寫作的研究生。他們為這些資深記者作了口述歷史，才能使已經逐漸褪色的陳年往事呈現在我們眼前。我有幸能為這本書寫序，也以之為榮！願我們的社會與新聞界都能從這本珍貴的生命史中得到啓發與勇氣！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日於淡水河畔
（作者為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孫震

〔推薦序〕

台灣新聞自由今昔

台灣於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廢除戒嚴令，第二年一月一日開放「報禁」。所謂「報禁」是根據行政院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所發布的行政命令，限制新報紙出版和限制報紙張數。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為紀念解除戒嚴、開放報禁二十年，提出資深記者訪談計畫，以走過戒嚴時期為核心，記述他（她）們的專業生涯，向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申請贊助。我還記得不久前董事會通過台大新聞研究所的申請，轉眼之間，計畫完成，撰成《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一書，邀請贊助單位寫序。

徐元智基金會雖然贊助台大新聞所此一訪談計畫，但完全不參與其訪談活動，也不與聞訪談內

容。不過台大新聞研究所是我在台大時所創辦的研究所，張錦華教授是我從政治大學禮聘回台大任教的傑出校友，她繼喻德基教授為新聞所所長，多年後再回任所長，為台大新聞所的發展付出很多心力，有很大的貢獻。我想向張教授及新聞所舊友表示感謝、祝福之意，並藉著這個機會對本書所檢討的新聞自由表達幾點感想。

第一，新聞自由不但是人民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而且對國家的政治安定有正面、重要的意義。新聞自由最大的功能在於報導事實，反映民意，使與公共利益有關的真相顯現，罪惡無所遁形，問題早獲解決。限制新聞自由，並不能改變事實，反而喪失反省改過的機會，使問題更趨嚴重，為自己製造敵人，終致失去人民的支持。本書對十七位資深政治記者的訪問，充分透露了這樣的訊息。

第二，如今解除戒嚴已經二十年，台灣的新聞媒體真的自由了嗎？公開直接的控制，如過去之經由「警總、調查局、國民黨文工會、軍方政工單位」，的確不存在了。但代之而興的是隱性迂迴的控制方式，例如通過銀行貸款與企業廣告施加壓力，甚至直接以各種方式「收買」媒體；又如所謂「黨政軍退出媒體」也只是換黨做，唯較前更為明白張膽。

我記得前聯合報社長、我的老朋友張作錦兄在他的《試為媒體說短長》一書中，將台灣新聞自由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威權政治之下，新聞自由受到箝制，媒體只有「邊緣性自由」；第二個階段是解嚴後媒體取得形式上的自由，但仍有各種正面和反面的干擾，正面的干擾是獎賞或好處，反面的干擾是懲罰或壞處，而獎賞比懲罰更能殺傷新聞自由；第三個階段是不論媒體寫什麼都不發生作用，一切批評被解釋為不懷好意，因而不予理會。作錦兄的第三個階段，我稱之為恬不知恥、麻木不仁的階段。

今年初，我和于宗先、李瞻合編一本《台灣危機》，作者都是台灣學術界的知名之士，先後送給一家大書局和一家大出版公司，都有所顧慮，婉拒出版。我和宗先兄、李瞻兄諒解他們的處境，但對

台灣在表面上的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下所隱藏的肅殺之氣，感到不寒而慄。

第三，當前的新聞自由一方面受到表面上看不見、實際上存在的政治勢力干擾，另一方面則在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引導下無節制地氾濫。李瞻教授在《台灣危機》第七章〈台灣報業危機〉一文中說：「新聞內容充滿詐欺、綁架、搶劫、凶殺、吸毒、縱火、強暴、亂倫、虐童、誹謗、侵犯隱私、父母率子女集體自殺等，不忍卒讀與駭人聽聞的社會新聞，甚至有些新聞報導不實，或出於捏造。」為了生存競爭不擇手段，不顧社會後果，將學校時期可能熟知的社會責任、道德規範拋諸腦後。「中華民國群我倫理促進會」從二〇〇一年起，隔年作「社會信任調查」。最近三次調查結果，倒數第一名亦即最不受社會信任的人都是立法委員，倒數第二名都是新聞記者。一向充滿正義感的新聞記者可能感到冤枉，他們是受報老闆之累，而報老闆可能也覺得冤枉，他們要維持報紙生存，不得不順從市場。康德說，當自私進入我們心中，就再也不能辨別善惡是非。

我想台灣很多人對報紙有很高的期待。我們希望報紙，至少一部分有格調、有理想的報紙，只是一種商品，而是一種教育文化事業，為社會維護價值，提供教育，捍衛正義。我年輕時在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念學位，奧大餐廳牆上寫著奧克拉荷馬州聞人威利·羅傑的名言：「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從報紙學來的。」媒體人能不感到責任重大嗎？

